

生态女性主义:激进环境哲学冲突、对话、合作的学术场域

胡志红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紧密关联,锁定父权制是导致女性压迫与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号召广大妇女发动一场以拯救地球和人类、重构天地大美为宗旨的生态革命。作为一种激进的哲学思潮,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与传统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及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冲突、对话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绝非是对其他理论进行“剪刀加浆糊”式的简单拼凑,相反,其透射出与其他环境哲学伦理迥然不同的批判锋芒,显示出其独特的环境伦理建构力量。本文多维度、多层面地就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激进派别在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冲突与对话、甚至合作进行简要的探讨,以凸显其独特、深沉、周全的视角,彰显其丰富内涵及其生态阐释力。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冲突;对话;合作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4)01—018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12SA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志红(1965—)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文化、生态批评。四川成都 610068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弗朗索瓦兹·德奥波妮(Françoise D'Eaubonne, 1920—2005)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旨在论证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紧密关联,锁定父权制是导致女性压迫与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号召广大妇女积极主动地发动一场以拯救地球和人类、重构天地大美为宗旨的生态革命。作为一种激进的哲学思潮,随着生态形势的日益恶化,生态女性主义逐渐发展成熟,并延伸到文学、艺术及文艺批评等领域,成了一种激进的批评范式、批评方法。其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女性主义的修正、继承、超越与发展,其间既有与社会生态学之间的冲突与对话,也有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与超越,更有对自身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修正与完善。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是在充满对立与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绝非是对其他理论进行“剪刀加浆糊”式的简单拼凑,相反,其透射出与其他环境哲学伦理迥然不同的批判锋芒,显示出其独特的环境伦理建构力量。在此,笔者主要就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激进派别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冲突与对话、甚至合作进行简要的探讨,以明证其独特、深沉、周全的视角,彰显其

丰富内涵及其生态阐释力。

一、对环境哲学进行生态女性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环境哲学,甚至主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重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古至今的各派哲学,包括当今的环境哲学,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因为它们都忽视女性认知、阐释、体验世界及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特有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德博拉·斯莱瑟(Deborah Slicer)这样说道:“正如哲学及其任何一门亚学科在诸多方面都可能陷入男性中心主义的泥潭一样,环境伦理也可能在诸多方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男性中心主义”。对此,哲学学者已经勾勒出了哲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四种表现形态,这四种形态也与环境哲学密切相关。

一是贬低妇女成就的男性偏见。具体来说,“贬低”指“抹杀、庸俗化或干脆就藐视”妇女的作品、手稿或影响等业绩,比如在环境哲学中,包括深层生态学,对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男性环境作家慷慨泼墨,而对像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这样的女性科学家、环境作家、环境主义者

却蜻蜓点水,甚至“惜墨如金”;

二是主流男性哲学家,也包括深层生态学家,常常忽视女性特别关切的问题,诸如生养孩子、传统家庭生活的内涵、个人及情感关系等。这些主流男性哲学家大多对压迫女性和强暴自然的手段之间关联性及其相互强化的特征也漠然置之。环境破坏性技术和环境危害同时也对女性的生理性别、生育能力,对她们的孩子、家庭及生计造成极大的破坏,进而侵蚀了女性的威信与能力。由于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运作导致了自然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自然化,因而妇女和自然都遭受了那些旨在占有、操控她们,尤其是操控她们的生育能力的侵略性技术的暴力;

第三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指的是赤裸裸的厌女症,这在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康德(Kant)等哲学家的作品中明显存在。当然,在当代哲学及环境哲学文本中,尽管这种放肆的厌女症似乎不太常见,然而,某些深层生态学家也传承了西方文化那种古老的厌女症格言“女人是被看的,而不是被听的”;

第四种属于表现得较为隐晦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尽管这种偏见的隐蔽性强,但在当今的哲学领域依然很有市场,这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对许多环境理论、概念及方法的透析中可清楚地看出。瓦伦(Karen J. Warren)、普拉姆德(Val Plumwood)等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们在对男性环境哲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辛格(Peter Singer)、雷根(Tom Regan)等的动物权利拓展伦理及奈斯(Arne Naess)、福克斯(Warwick Fox)等的深层生态学理论分析后指出,他们的作品中浸透出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因为他们在建构自我、个体、社会及与他人的关系时,要么过分强调理性主义原则及非语境特征,要么强调抽象的、原子主义的个体主义原则,忽视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埃尔·凯·萨勒(Ariel Kay Salleh)在将环境伦理学的不同认识论观点与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观点进行比较后指出,深层生态学家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是“单层的、直线式的,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解则是多层次的、曲线式的”。也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积聚在环境上的问题错综复杂、里应外合,进而强化了社会压迫。^{[1](P.35-38)}

根据以上分析,当下的环境伦理深受男性中

心主义的浸染,必须进行生态女性主义改造,为此,沃伦提出了八条对任何伦理,包括环境伦理,进行女性主义化的“边界条件”或者说最起码的条件,这些条件旨在拒斥社会统治的多重歧视,其主要包括语境主义、包容性、根本性重构关于人的概念及物种之间的关系等,对环境伦理的生态女性主义重构代表着其力量与前景。^{[2](P.516-521)}有鉴于此,女性主义、深层生态学及其他环境伦理要深刻探求环境问题的根源,制定出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文化策略,必须进行生态女性主义化建构,“至少必须承认、谴责、涤除其理论探讨、理论建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将对其他受压迫的族群的分析也纳入其对自然压迫的探讨之中”^{[1](P.39)},因为自然歧视与多种多样的社会压迫,包括性别歧视,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这种认识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杰出洞见,认识、革除这些犬牙交错的压迫形式,并找到相关的理论与策略是任何环境伦理的希望所在,也是其最严峻的挑战。

二、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的区别:对生态危机根源的不同界定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马丁·基尔(Martin Kheel)也在其《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对身份与差异的反思》一文中从哲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契合与差异。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都反对环境伦理领域内重视义务与权力观念的价值理论,它们注重的不是抽象或理性地计算价值,而是培育一个尊重一切生命的意识“它们呼吁内在变革,旨在达到外在变化”,具体来说,试图通过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的变化,而达到外在自然的物理变化,或者说,人类要解决自然生态问题,首先要解决人之精神生态问题,要有健康的自然生态,必须首先要有健康的精神生态,从这层意义上说,“它们都被看成是‘深层的哲学’”^{[3](P.128)}。深层生态学运用自我实现的观念描述这种内在变革。

然而,在理解环境顽疾的根源时,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对深层生态学家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应该首先受到抨击,其两个原则——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旨在校正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然而,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男性中心主义世界观应该首先受到谴责,这样看来,要首先废黜的不仅仅是“人类”,而且还包括男人和大男性主义世界观的至尊地位。^{[3](P.129)}

理解两派哲学间差异的关键在于它们预设的不同的自我观念。深层生态学家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和提出“扩大的自我”观念时,他们所指涉的是一个性别中立、种族中立、阶级中立的自我观念,忽视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将所有人进行均质化处理,视为无差别的人,因而都应对环境危机承担相同的罪责。然而,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体验世界以及建构自我的观念迥然不同。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将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中心或顶端,然而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男性独有的世界观,女性身份无需通过抬高自己、贬低自然而建构。相反,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与自然世界一同遭贬,视为“他者”,被“置于被看的他者角色”,对此她们也常常表示认同,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因此与其作为“他者”的地位密不可分。可是,真实的男性主体性是通过贬低、控制、掠夺、征服、改变自然而确立,“独立的男性自我观是通过挫败女性形象的他者而建立”,也就是说,“自我是通过与他者的敌对关系而出现的”,这样看来,男性自我是在“既否定妇女,也否定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建立的。^{[3] [P. 129 - 131]}由此可见,深层生态学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保持性别中立做法显然有失偏颇。

三、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不同重心:个体与整体的共存抑或个体的消融

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其存在忽视个体生命的危险。尽管深层生态学家认为,扩大认同范围会确保人类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个体存在的伤害,因为个体存在也是包罗万象的大写自我(或生态自我)的一部分。然而,将这种自我认同范围扩大到生物共同体或整体存在一个大的危险,那就是超越个体生命的存在,甚至试图通过杀戮个体生命(比如狩猎、捕鲸等血腥运动)而完成自我实现,深层生态学家极力呼吁具有最为广泛意义的认同“不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而是对大的生物共同体或整体的认同”,“这种对大的生态‘整体’认同的偏爱,折射出我们所熟知的因偏爱更持久、更抽象的事物而超越局部具体世界的男性冲动”^{[3] [P. 135 - 136]}。这可从利奥波德的以下声明中可看出“一个事物,只有有助于维持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丽,才是正确的。如果它背道而驰,它就是错误的”^{[4] [P. 345]},该声明被奉为当代环境伦理的金科玉律,但是,其强调的是共同体的整

体利益,而没有考量个体存在的利益,甚至为了整体利益,可牺牲个体利益,但这种个体往往是社群的弱势群体,无论他们是人或动物,因而深层生态学常被指责为环境法西斯主义。

深层生态学家让人相信自我实现是认同范围扩大的简单过程,其旨在认同自然世界的一切存在物,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却要深刻检视促使自我拓展的无意识动机。通过基尔的深刻分析,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动物或自然存在物一直被用作确立男性自我的心理工具,环境哲学家在探讨男性认同自然,甚至融入自然的路径时,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自我实现的过程是通过捕杀行动而完成的。^{[3] [P. 131]}只不过环境哲学中自我实现蕴涵的征服心理似乎是在较高的层次运作,动物依然被当成自我界定的工具,不同的是,这一次它们不是以个体男性自我的名义而是以崇高抽象自我的名义而牺牲。可是,不管这个“自我”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动物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都是失去生命。因此,在基尔看来,“抽象地认同大整体的危险是不能认识或尊重独立生物的存在,实际上,这是环境哲学和环境运动的主要缺陷之一”^{[3] [P. 136]}。笔者认为,这也是环境公正运动对抗主流环境主义和环境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深层生态学家一味将生态系统或膨胀的自我提高到至尊的地位,其结果是他们所建构的整体主义有抹杀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危险,因而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总是警惕超越个体存在领域的整体主义哲学,而主张“深层的、整体主义的一切生命相互关联的意识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存意识,是我们在与个体存在物及大的生态整体关系中所体验的意识”^{[3] [P. 136 - 137]}。

四、多视角的深度对话:凸显生态女性主义“更深的”特征

美国哲学学者迈克尔·E·齐默尔曼(Michael E. Zimmerman)也在其《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对话的兴起》一文中主张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开展对话。在他看来,尽管二者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似乎有些相似,都认为生态问题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顽疾的表征,可它们锁定的文化病根却相去甚远,因而它们的生态观常常大相径庭。齐默尔曼也认为,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深层生态学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而生态女性主义却认为父权制或男性中心主义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性文化因素,这是

由于男性与女性的自我意识存在深刻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不同。

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都认为,诸如二元论、抽象理性、僵化的独立自主及原子主义等一系列西方文化范畴极大地推动了“物质进步”的事业,然而,这一“进步”也给西方,乃至世界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环境灾难,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若要学会以恰当的方式栖居地球,就必须变革这一系列范畴。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父权制文化不只是由二元论、抽象理性及僵化的独立自主等范畴所决定,而且还受到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这个关键范畴的制约,这个范畴严重制约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决定了她们与自然的关系。为此,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从多角度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凸显生态女性主义比深层生态学“更深的”特征。

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阿里埃尔·凯·萨勒(Ariel Kay Salleh)看来,深层生态学家运用抽象的形而上话语谈论具体现实的生态问题,这本身就是父权制文化熏陶出来的男人的典型特征,然而女性往往运用具体、个性的话语谈论与他人及地球的关系。她甚至近乎苛刻地写道“与他人和自然疏离的男性自我在绝望中作了最后的尝试,杜撰了深层生态学,企图重续他在个体化的杀母过程中已否认的与世界的关系”^{[5](P.146)}。男性哲学家吉姆·切尼(Jim Cheney)也认为,父权制范畴也存在于深层生态学基本的纲领之中,这从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将权利观引入其理论之中一事便可看出。奈斯既强调权利对于一切存在物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必然冲突。在切尼看来,权利一说是孤立自我的自我所采取的一种人类观,人类自我为限制竞争而赋予彼此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要求每个自我必须给予尊重。然而,根据权利观设想的生物圈平等,又暴露了与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必然牵连的原子主义社会观。此外,切尼还通过对深层生态学的关键要素之一——“直觉”理念的进一步剖析指出,深层生态学蕴藏牺牲个体利益、服务于整体利益的生态极权主义危险。^{[5](P.146-147)}像切尼一样,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马丁·基尔(Martin Kheel)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仅仅靠拒斥形而上的社会原子主义,并以形而上的社会关系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关系总是发生在有一定价值的现实个体存在之间,离开对个体的现实关爱,而一味强调关

系网络的整体利益,必然否定、牺牲个体的存在与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新版的自我意识或个体化意识,这种意识既拒斥孤立的自我,也反对浑浑噩噩、抹杀个性的混为一团,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学者凯瑟琳凯勒(Catherine Keller)提出生态重释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心理学理论以建构女性生态自我意识观。荣格认为,在一个人的晚年生活中,其本我的任务就坚定重申它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在个体化过程中暂时遭到否定的关系。一个人要获得本真的个性,必须体验与万物生灵之间所存在的根源上的关联,在凯勒看来,这才是荣格心理观的精髓。“一个超越本我的自我身份基本上是基于关联的,从而暴露了本我个性是虚假的个人主义和杜撰的人格面具,荣格激进、敞亮的世界胸怀指出了关联自我的本质”^{[5](P.148)}。

深层生态学尽管了解分离的、鄙视身体的、独立的自我主体与自我借助技术对控制自然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也致力于探求不同的思想传统以替代这种分离及对权力追求的偏执。然而,深层生态学所设想的超验的生态自我,旨在克服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区分的尝试,潜藏着双重危险:一、个体可能丧失其作为个体的完整性,因为牺牲个体以保全整体的利益是合理的;二、无论是根据小写或大写的自我界定本真的自我身份似乎忽视了女性主义认为对建构自我身份至关重要的因素——关系。^{[5](P.151)}

由于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持有不同的观点,进而导致它们对“人类”也持有不同的看法。深层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傲慢,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道德原则取而代之,以遏制人类傲慢的偏好,然而,却走向了问题的另外一端,依靠形而上的宏大构想,贬低人类在宇宙构架中的作用,试图将在人类伦理空间内谈论非人类世界的所有举措都归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总是对贬低人类在世界中的作用的形而上伦理原则怀有戒心,并认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只能用从人类特有的性格中提炼出的原则和智慧的话语理解如何对待非人类存在物。用切尼的话说,“恰当地保持人类/非人类的区别‘并不意味着维护道德等级制,但能构建道德共同体’”^{[5](P.151)}。只有在完全

成熟的道德共同体中,人们才能首先认识到如何关怀人、关怀自己,进而关怀非人类存在。原子主义的父权制个人主义摧毁了人类共同体的大部分领域,这种残缺的共同体不能理解其成员的需求,更不可能了解非人类的需求。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适当回应非人类世界的需求之前,我们得重构一个成熟的人类共同体,以便我们又能学会互相关怀,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以恰当的方式将关怀延及非人类存在。离开人类相互关照的能力而谈关怀非人类世界是没有意义的空话,只有那些有需求并具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的人,才能使得人类能关怀非人类存在的道德语境变为现实。

五、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对话与互补

1991年,瓦尔·普鲁姆德在其《自然、自我与性别:女性主义、环境哲学及理性主义批判》一文中深入开展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对话,批判了理性文化对所建构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他者”统治,指出了深层生态学在解决环境危机所采取的形而上文化路径的严重不足,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应对环境危机所采取的可能有效的“女性”特有的路径。与此同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姆德指出了深层生态学 with 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沟通、交流、对话甚至共存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分别所抨击的主要敌人——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实际上都是人类理性建构“他者”的必然产物,是理性统治自然“他者”或女性“他者”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两派哲学可以成为盟友,共同应对环境危机。

普鲁姆德指出,深层生态学甚至环境哲学遭到诸多指责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忽视了对“敌视女性和自然”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批判,并试图运用该传统中破坏性的预设建构新的环境哲学,然而,这种环境哲学利用或干脆将自己置于深陷性别偏见和自然偏见的理性主义哲学框架之中,因此,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环境哲学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诸多偏见,从而难以建构理论上真正周全、深刻,实践上行之有效的环境伦理原则。普鲁姆德分析指出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建构人的理念、自我理念及自然理念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深层生态学就是基于这些理论框架,因此难逃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泥潭。西方理性主义以理性建构人的理念,以工具理性建构自我,从而决定了男性自我与“他者”之间所存

在的以断裂为特征的一种主仆甚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分析了二元论的建构机制,揭露了其统治的本质。二元主义建构二分的典型特征是两极化差异性,最小化共性,然后沿着优越/低劣的线路建构差异,视低劣方为优越方达到崇高目的的工具。由于优越方实际上是在对立中界定的,因而其任务,也就是其实现自己和表达自己真实本质的途径就是“脱离、统治及操纵低劣方”这种情况出现在人类/自然及其他的二元对立之中,像男性/女性、人类/自然、白人/黑人、理智/情感,等等。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挑战这些二元对立结构,仅重估优越/低劣及提升低劣方的地位是不够的,还必须重审和重构二元建构的范畴本身。针对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结构来看,就不仅仅是提高自然的地位问题,或采取别的策略,而其他一切一如既往,还要做的就是重审和重构关于“人的概念”及与其相对的关于“自然的概念”。因为“人的概念”或者说,“完善、纯粹”的人的概念,是通过排斥与低劣的自然界相关联的一切之后在对立中界定的,这与建构男性/女性、理性及其对立面等范畴的机制一致。尽管人同时具有生物特征和精神特征,但只有精神特征被看成是人的特征,代表了充分“完善、纯粹”的人。因而,“人”不仅是个描述性的,而且还是个具有价值判断的术语,它树立了一个理想:人类最基本或有价值的品质要排斥自然的成分。尽管该概念未必否定人具有物质或动物的成分,然而,在此框架中,这种非精神的成分被看成是外来的或非本质的,不是“完善、真实”人性的有机构成。人的本质常见于操控人的内在与外在自然之中,呈现在理性、自由及对物质领域的超越等品质之中,这些品质也被看成是男性品质,因而人的概念的模型与男性概念模型是一致的。以上一些特征也是男性理想的特征。^{[6] (P. 168-169)}

根据以上对人的概念建构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挑战人/自然二元论就必须承认这些遭排斥的品质——被分离的、被否定的、被建构为外在的,或被理解为属于像妇女和黑人之类的低等人类族群范围的——也完全属于人类的品质”^{[6] (P. 169)}这就提供了承认与自然世界关联的基础,像抽象的设计和计算能力一样,生育、肉欲及情感也被看成是完善、纯粹之人的品质。

普鲁姆德也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在建构

人(尤其是男人和白人男性)与他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工具主义特征,这种工具理性在建构人及自我是基于断裂而非连续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剥削与统治。为此,要重构人类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就涉及到两个方面,重构人及重构自我,尤其是建构非工具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在建构自我时,工具理性与断裂之间共谋,将他者变成了实现自己目的或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整个世界成了一幅工具图景。要从根本上改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以关系的世界图景取而代之。正如瓦伦认为的那样,“因为关系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也不是人性外加的特征,它们在形成人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人类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特征”^{[7] (P.33)},因此,普拉姆德认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relationship)是深层生态学家们阐释内涵丰富的自我的一个好路径,然而,他们却以整体主义取而代之。

1992年,普鲁姆德在《作为一般压迫性理论的生态社会女性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作为一般压迫性理论的生态社会女性主义”构想,旨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及深层生态学等反统治的解放性理论之间合作的路径,共同拆解压迫性网络,以更好地应对环境危机。在她看来,以上三派激进的环境哲学思潮之间论争涉及了真正有价值的议题,但却“受到争强好胜的还原论惯性思维和不必要的排他性特征的干扰”,从而导致对统治问题的分析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进而不可能建构出具有活力的理论。还原性立场声称自己具有可同化吸收其他被还原的批评策略的“基本的或宏大的批判范式”,凡是不能被还原的则被放逐。

在普拉姆德看来,三派哲学都在谈统治,并试图消除统治,这样看来,统治的概念为它们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明确了共同的政治方向。因为社会与自然本是一体,所以自然统治与人类统治必然相关,或者说,自然统治与社会统治形成了一个犬牙交错的压迫性网络,所以,成熟的环境伦理既要探求各种压迫形式之间的关联机制,又要加强各派环境伦理之间的合作,这就呼唤能联合深层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的第三种伦理立场的诞生,在普拉姆德看来,生态女性主义就能担当此任。当然,联合不是消除差异,强行统一,抑或将它们同化为囊括一切的理论或运动。

生态女性立场庞杂,既有深层生态学取向的,也有社会生态学取向的,还有激进或其他形式的女性主义取向的。然而,“作为一般立场的生态女性主义既不谋求还原或放逐深层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统治的批判,也不同化或放逐社会生态学对人类等级制的批评’,而试图综合两派的观点”^{[8] (P.211)}。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形式主要涉及合作而不是竞争性、排他性的运动策略。女性统治当然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解统治的关键,但也是其他许多统治形式富有启发意义的范式,因为“被压迫者常常既被女性化,也被自然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常常强调女性统治、族群统治及自然统治之间的联系,因而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写道“生态伦理也必须是承认社会统治与自然统治的生态公正伦理”。生态女性主义者德博拉·斯莱瑟(Deborah Slicer)实际上也在其《成长过程中的迷雾》一文中指出了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合作的可能性。在她看来,要真正确定生态危机的终极的历史或观念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能的,因为多重的压迫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能分辨出哪个是根本原因,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的实践和理论价值。在该文中,斯莱瑟在分析了瓦伦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力量与前景》一文后,指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之间的观念联系,甚至人类中心主义也是男性中心主义。^{[1] (P.29-32)}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许多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的工作预示着作为一般压迫性理论的生态社会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8] (P.211)}。

澳大利亚哲学学者弗雷亚·马修斯(Freya Mathews)在其《确立与自然的关系》一文中从新的视角深入地分析了深层生态学的内涵及其认同困境后指出,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互补关系,可以相得益彰。马修斯认为,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都阐释了建构、体验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深层生态学基本上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自然观,其自然世界的意象像一整块土地,人与其他个体都是其组成部分,其鼓励人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然认同甚至“宇宙认同”,以确立自己的真实身份,让自然世界成为我们的延伸,我们的大写自我,最终获得“宇宙般的自我实现”。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义务是尊重与服务于这些共同的

利益。比较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往往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存在物构成的共同体,像一个家庭一样,彼此密切相关,但又各自保持独立。这就要求我们尊重这些不同存在物的个性,而不要试图与他们融为一体,我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开诚相见、关怀体贴的方式与其遭遇之后所确立的,而不是由抽象的形而上前见所设定的。据认为,这种遭遇所生发的理解自然会产生关怀之情或同情之心,这正是生态伦理的基础。在建构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上,这两哲学派别所提出的路径相互冲突,但是深层生态学宏大的形而上理想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亲情和关怀伦理可以相互补充,达到整体与个体间的和谐。

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将深层生态学的崇高道德降到人的高度,宏大的宇宙认同被降到拯救个体自然存在,与遥远的星球、广袤的宇宙合一的大写生态自我被拉近到对自己熟悉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等自然个体的热爱。因此,马修斯认为,“尽管生态女性主义人化了深层生态学,反过来,深层生态学的确也深化了生态女性主义”^[9](P.24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抵抗之基础依然在于人类,而不在于大写的自我或遥远的星球。认识到人类不仅是令人揪心的毁灭之源,而且也是对抗毁灭的宝贵情感——慈悲——之源,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认识,不仅帮助搭建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深层生态学沟通、对话甚至合作的平台,而且还提升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境界,激活了深层生态学的行动主义诉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因人与自然分离所造成的道德死胡同。

结语

概而言之,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深层生态学的主要不足之处表现在其过分强调无差别整体主义和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唯一的文化根源,忽视了导致生态问题的庞杂、深层的压迫性关系网络,进而对与环境退化似乎存在直接关联的诸多问题进行单向度的分析,因而宣称对生态危机进行“深度”探源的深层生态学得出了“浅层”的结论,提出了偏颇或偏激、甚至错误的应对危机策略。而生态女性主义锁定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文化根源,并将其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压迫观念相联系,对父权制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联进行多向度、多层

次的“深度”分析,“深层”追问生态危机的思想与现实根源,综合考察种族、阶级、性别及土地(或环境)四大范畴之间的复杂纠葛。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因此就孤高自许,而主张包括深层生态学在内的各派激进环境哲学进行通力合作,取长补短,这样既能激发人的内在精神动力,让健康的精神生态守护自然生态,也能充分调动女性参与环境运动的激情,并成为其中坚力量,从而为环境主义运动注入现实的社会政治动力,让探寻构建基于公平正义的性别、种族和谐的社会运动也成为重拾天地大美的生态运动。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在探索走出环境困境的诸多路径方面,进行理论上更为深刻、视野上更为宽广、实践上更为可行的尝试,是形而上的乌托邦理性与形而下的现实策略的结合。

参考文献:

- [1] Deborah Slicer, “Wrongs of Passage”. In *Ecological Feminism*. Ed. Karen J. Warre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2]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 Ed. James E. Whit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3] Martin Kheel, “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Eds.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 [4] [美]阿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张富华等译. 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5] Michael E. Zimmerman, “Deep Ecology and Ecofeminism: the Emerging Dialogue”. In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Eds.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 [6] Val Plumwood, “Nature, Self, and Gender: 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y*. Ed. Karen J. Warr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y*. Ed. Karen J. Warr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8] Val Plumwood, “Ecosocial Feminism as a General Theory of Oppression.” In *Ecology: Key Concepts in Critical Theory*. Ed. Carolyn Merchan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4.
- [9] Freya Mathews, “Ecofeminism and Deep Ecology.” In *Ecology: Key Concepts in Critical Theory*. Ed. Carolyn Merchan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4.

收稿日期: 2013 - 10 - 15 责任编辑 申燕